

非自然叙述学

王长才

内容提要：非自然叙述学是西方叙述学界近年来引起较大关注和反响的热点话题之一，它们从相对被忽略的偏离主流模式的叙述实践和现象出发，凸显主流叙述学理论和框架的不足，试图对叙述学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和拓展，以期公正地对待这些叙述实践。非自然叙述学并不是指一种“非自然的”叙述学，而是对“非自然叙述”的系统研究或理论化。它不是一个有着统一的概念界定、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致的研究方法的理论流派，而是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样态。

关键词：非自然叙述学；非自然叙述

一、缘起与发展概况

在美国学者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看来，主流叙述学试图建立适用于全部叙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其关注对象为主流叙述即模仿性叙述，而偏离此模仿规约的叙述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因而他大力倡导非自然叙述研究，致力于补正已有的叙述学理论。他的《非自然声音：现当代小说中的极端叙述》(*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6)从反模仿性作品的阐释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命题，恰恰与倡导“走向自然叙述学”的德国叙述学家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非自然叙述学勃兴的开始。2008年国际叙述研究学会年会上，他和扬·阿尔贝(Jan Alber)、斯特凡·伊韦尔森(Stefan Iversen)、亨里克·斯科夫·尼尔森

(Henrik Skov Nielsen)组成了“‘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超越模仿模式?”(“*Unnatural*” Narratives —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 Mimetic Models?”)分论坛,后来他们将发言合成一篇文章,发表于2010年的《叙述》(*Narrative*)上,这就是被视为建构“非自然叙述学”的宣言的《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超越模仿模式》。随后这一话题引起了众多叙述学家的兴趣,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态势,每年的国际叙述研究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Narrative)年会都有名为“非自然叙述学(理论)”的两至三个分论坛,此外还举办过多次以“非自然叙述学”为主题的研讨会,比如“非自然叙述”(Unnatürliches Erzählen,德国弗莱堡,2008.11)、“哪些叙述学超越模仿性叙述学?”(Which Narratologies Beyond Mimetic Narratology?,法国巴黎,2010.9),等等。许多学术期刊都推出了“非自然叙述学”专辑,如《叙述》(*Narrative*,2010.2;2012.3)、《故事世界》(*Storyworlds*,2013)、《涵义》(*Connotations*,2013/2014)等。多部相关论文集分别在德国、美国出版,如《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Unnatural Narratives – Unnatural Narratology*,2011)、《叙述虚构中的奇怪声音》(*Strange Voices in Narrative Fiction*,2011)、《非自然叙述诗学》(*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s*,2013)、《超越经典叙述：跨媒介与非自然挑战》(*Beyond Classical Narration: Transmedial and Unnatural Challenges*,2014)等。此外,在《叙述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2012)中,布莱恩·理查森代表非自然叙述学,与修辞叙述学、认知叙述学、女性叙述学的理论家分别就叙述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阐释,并彼此交锋。丹麦奥胡斯大学“叙述研究实验室”(Narrative Research Lab)特别设立“非自然叙述学”研究项目,并在全球范围内邀请重要学者参与,编纂了在线版《非自然叙述学词典》。随后理查森的《非自然叙述：理论、历史与实践》(*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2015)和扬·阿尔贝的《非自然叙述：小说和戏剧中的不可能世界》(*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2016)相继出版,更集中明确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掀起一个小高潮。

如果说,从2006年理查森的《非自然声音》到2015年、2016年理查森和阿尔贝专著出版是非自然叙述学的萌发期,2016年至今可算是非自然叙述学的深入发展期,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相关论述不断涌现,使得非自然叙述学不折不扣地成了叙述学界的持续热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著名学术期刊《文体》(*Style*)2016年冬季号为“非自然叙述理论”特刊,由布莱恩·理查森撰写一篇阐明自己观点的目标文章(Target Essay),并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叙述学家进行讨论,最后由布莱恩·理查森回应。参与讨论的理论家不乏詹姆斯·费伦、安斯格尔·纽宁(Ansgar Nünning)、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H.波特·阿伯特(H. Porter Abbott)、玛丽-劳拉·瑞恩(Marie-Laure Ryan)、申丹等活跃在叙述学界的重量级学者,而阿尔贝·尼尔森、伊韦尔森、玛丽亚·麦凯莱(Maria Mäkelä)等主要非自然叙述理论的倡导者也都参与讨论,并表明了各自的立场。这是自非自然叙述学被提出以来进行的最集中、最深入的展示和讨论。此外,《故事世界》2016年冬季号“女性主义和非自然叙述理论”专辑和《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2018年春季号“关于叙述的认知和非自然的视角”特刊都就非自然叙述理论与后经典叙述学其他分支之间的关联展开讨论,尤其是后者,就模仿、虚构性、聚焦、虚构心理、事件、沉浸、阐释和叙事媒介等论题,分别请非自然叙述理论和认知叙述学双方的学者共同撰写,展开深入对话。另外还有由理查森担任客座编辑的《叙事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Narrative Studies*)两期特刊:2017年下半年刊的“实验文学与叙述理论”(“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nd Narrative Theory”)和2018年上半年刊的“非自然叙述:理论与实践”(“Unnatural Narrativ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这些都体现了学界对非自然叙述理论的关注热度。

如上所述,非自然叙述理论在西方叙述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成为后经典叙述学中发展最为迅猛、影响最大的分支之一。修辞叙述学家詹姆斯·费伦对非自然叙述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几次对叙述学现状的梳理及对未来的展望中,都对非自然叙述理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如,他为罗伯特·凯洛格(Robert L. Kellogg)和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叙述的本质》(*The Nature of Narrative*)四十周年修订版撰写的第八章《叙述理论,1966—2006:一个叙述》(“Narrative Theory, 1966 – 2006: A Narrative”),以及为大卫·H.里克特(David H. Richter)主编的《文学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Literary Theory*)撰写的第六章《当代叙述理论》(“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y”)中,都将非自然叙述学(反模仿叙述理论)作为主要趋势的代表。在他看来,非自然叙述学“迄今为止的结果是有益的,因为理查森成功地引起了人们对故事讲述史中非自然的重要性的关注,因为他提出了很多富于洞察力的工具与概念以处理这种语料,(比如‘消解叙述’的概念,对第二人称叙述与第一人称复数叙述

的描述),因为他已经发展了对具体叙述的许多富于洞察力的分析”(Phelan 414—415)。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也表示:“……最吸引我的是所谓的非自然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的起点是抵制模仿还原论,抵制那种我们可以通过基于现实主义参数的各种模式来使叙事产生意义的假设,所以它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诗学分支,是对我们使各种怪异的文本产生意义的各种程序的研究,而怪异文本正与怪异行为和非自然的声音一起日益不满虚构的世界”(乔纳森·卡勒 5—6)。因此,阿尔贝与理查森宣称:

在过去的十年里,非自然叙述学已经发展成为叙述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富有成效的新范式。通过关注反模仿叙述和技巧,并确定虚构叙述的反现实主义和不可能的特征,它为叙述学带来了新的文本世界,并创造了一些新的分析类别来描述它们的运作和处理它们的潜在方式,如叙述者、人物、时间性和空间环境的新模式,对融合的新视角,以及一些创新的阅读策略。它还提供了一种审视更熟悉叙述的新方式,如全知叙述或其他使用零焦点的文本,现在正被用于越来越多的文类和叙述媒介。(Alber and Richardson 1)

二、什么是“非自然叙述”?

非自然叙述学的基础并非所有的叙述,而是偏离主流叙述的特定叙述。因而,确立这种特定叙述的范围和特性是非自然叙述学的前提。对于这个关键问题,非自然叙述理论倡导者们的界定各不相同。

布莱恩·理查森的非自然叙述是指与“模仿的”和“非模仿的”(non-mimetic)叙述相区分的反模仿(anti-mimetic)叙述。模仿叙述是以似真性为目标的非虚构叙述或与之相似的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非模仿叙述是指童话、寓言、超自然小说、幻想作品、经典科幻小说等叙述,它们在模仿叙述基础上增加了超自然成分。而非自然叙述是包含着明显的反模仿事件、人物、背景、框架的叙述,它们“违反非虚构叙述的前提,违反模仿期望和现实主义的实践,而且挑战现有的、已确立的文类的惯例”,“可能出现在故事中,出现在话语中,也可能出现在叙述的呈现中。也就是说,叙述可能完全是常规的,但故事世界可能是不可能的或矛盾的,或者故事世界可能完全是模仿的,而文本的叙述或呈现可能是非自然的”(Richardson 2016a: 492)。按照这样的界定,像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无法称呼

的人》(*The Unnamable*)、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r)的《嫉妒》(*La Jalousie*)、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等后现代作品是典型的非自然叙述。但非自然叙述并不限于后现代作品,理查森还在古希腊阿里斯托芬、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斯特恩、菲尔丁到安东尼·特罗洛普等西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非自然叙述要素,还在中国的《红楼梦》、印度梵语诗剧《沙恭达罗》等东方作品以及流行文化和民间叙述中发现了非自然要素,他甚至说非自然叙述“无处不在”(Richardson 2015: xiii),以突出这一领域被忽视的严重性。

扬·阿尔贝则以真实世界的认知参数作为参照,将非自然界定为“物理上、逻辑上和人类属性上不可能的场景和事件”,也就是“基于支配物理世界的已知规律、公认的逻辑原则(如不矛盾原则)或标准的人类知识和能力的限定,被再现的现象必须是不可能的”(Alber 2016a: 436)。按照阿尔贝的定义,不管读者是否感到奇怪,只要文本中出现不可能,就属于非自然,连童话、寓言、神话故事等常见文类都纳入其中。对此,阿尔贝又区分了已经规约化了的非自然叙述和正在规约化的非自然叙述。像童话中会说话的动物、科幻小说中的时空旅行、幻想文学中的魔法等,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已经被规约化了,人们习以为常,不再感到奇怪。而后现代主义作品仍然在规约化的过程中,因而人们暂时还不能轻松理解。这个定义很简单明了,布莱恩·理查森都表示“钦佩和嫉妒”(Richardson 2016a: 507),但认为这种定义“太过宽泛”(Richardson 2015: 13)。的确,尽管阿尔贝通过是否规约化对非自然叙述进行了区分,类似于理查森的非模仿和反模仿的分野,但是,即使日后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手法习以为常了,规约化了的童话和规约化了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仍然有性质的不同。或者用理查森的话来说,逻辑上的不可能和物理上的不可能不是同一性质。

亨里克·斯科夫·尼尔森对非自然叙述的界定是:

它们是虚构叙述的一个子集——与许多现实主义的和模仿的叙述不同——提示读者采用不同于她在非虚构的、对话式的故事讲述情境中所采用的阐释策略。更具体地说,这类叙述可能拥有的时间性、故事世界、心理再现或叙述行为,在真实世界的故事讲述情境中必须被建构为物理上、逻辑上、记忆上或心理上不可能或不可信的,但通过提示读者改变阐释策略,让读者将其解释为可靠的、可能的和/或作者性的。(Nielsen 2013: 72)

尼尔森的界定尽管提及了理查森与阿尔贝的定义,但和两人的界定也存

在着较大差异。理查森和阿尔贝的界定都以文本为基础,理查森的界定需要确认文本中出现对模仿框架的颠覆,阿尔贝的界定需要辨认文本中出现了不可能现象,而尼尔森界定的重点放到了阐释策略之上,强调是文本要求读者运用不同的阐释策略。因为引入了阐释策略的维度,而读者并非一成不变,这种界定相对多了一些动态性。尼尔森还赋予了非自然叙述更大的意义:“在我看来,‘非自然’作品中的‘非’(un)与‘无限的’(unlimited)中的‘无’(un)是同样的方式。它们没有受到自然地限制非虚构故事的规定的束缚,而是充分利用了叙述的全部潜力”(Nielsen 2016b: 474)。在此,尼尔森从实现叙述潜力的角度重新审视非自然叙述,因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非自然叙述比起受到种种限制的自然叙述,反而是更接近圆满的状态。

斯特凡·伊韦尔森最初对非自然叙述的明确界定是那些主导故事世界的规则与其中发生的情况或事件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冲突的叙述。后来他更强调非自然叙述作为修辞手段的性质,而非特定的叙述文类。“与其把非自然叙述说成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虚构叙述,一种自主创新的或实验性的文本,我们可以考虑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把非自然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来谈论,这种修辞手段是由产生意义的存在过程的关联,而不是与存在的文本或诗学的关系而界定”(Iversen 455)。他借用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来讨论非自然叙述,将它视为陌生化的一个子集。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是指延长感知的时间,从而更好地理解对象,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中陌生化的方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永久的陌生化”(permanent defamiliarization),“给受众带来不断抵制着人们认识的无法解决的谜语,以及永久的不可识别性”(Iversen 460)。伊韦尔森更强调非自然叙述的修辞功能,他认为这种定义相比理查森反模仿的界定更为灵活,可以摆脱对模仿叙述的依赖,也可以既讨论文本特性,又讨论阅读效果。在笔者看来,非自然叙述的确承担了修辞功能,但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种修辞手段,就有将非自然叙述纳入主流模仿框架之中的风险,其独特性也面临被消除的可能。

玛丽亚·麦凯莱对非自然性的界定更为宽泛:“是‘自然’阅读过程的认知反面,是让我们欣赏和还原虚构和文本再现的扭曲性和中介性质的反作用力”(Mäkelä 2016: 462),是“特殊文学类型的认知挑战”(the peculiarly literary type of cognitive challenge)。因此,她认为并不需要在先锋文学中寻找,“潜在的非自然性……总是已经存在于意识的文本再现

中”(Mäkelä 2013: 133)。她特别讨论了现实主义与非自然的关系,她认为,在我们所习惯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都存在着非自然的要素。比如,她以福楼拜、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小说为例,指出其中有些段落所呈现出的感知不是人物所能够体会的,并不符合其聚焦人物的感知,因而是非自然的。她认为“非自然是一种挑衅,而非一种特定的文类、文本或叙述手段”(Mäkelä 2016: 463)。

综上所述,非自然叙述学的倡导者都有各自的界定,这就使得非自然叙述学没有一种统一的面貌,几乎任何对非自然叙述理论的笼统谈论都不准确。这在有些学者看来,是非自然叙述学的致命问题。但这在理查森和阿尔贝看来并不是问题,这种多元和开放恰恰意味着多种可能性,他们编辑的《非自然诗学》(*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2013)、《非自然叙述学: 扩展、修正与挑战》(*Unnatural Narratology: Extensions, Revisions and Challenges*, 2020)等论文集都没有强求撰稿者的观点与自己的一致,甚至带着某种欣赏心态展示了各自的差异。理查森指出认知叙述学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分支,而没有人将这一点当作认知叙述学的缺陷,他也希望非自然叙述学得到同等的对待。

三、如何阐释“非自然叙述”?

除了对非自然叙述界定上的分歧之外,如何阐释非自然叙述也是非自然叙述学倡导者们讨论的焦点。

理查森的立场非常明确:肯定并保留非自然叙述,阐发非自然叙述颠覆模仿框架的特性及意义,并欣赏非自然叙述带来的乐趣。只有突出非自然叙述的特性,不将它混同于主流叙述,才不会抹杀其意义,这也是非自然叙述学的意义。理查森以“品特难题”(the Pinter problem)来说明这个问题。英国戏剧家品特的作品以大胆先锋而著称,批评家们采用了各种策略以使之“自然化”,比如称它是将梦搬上了舞台,是一种寓言,是对幻想的精确描绘,是对生活的真实的、不连贯的切片,是炼狱的视觉呈现等,不一而足。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出,品特的戏剧是处心积虑地、持续不断地对剧场再现规约的冒犯,而正是这一点使观众和批评家为之着迷。这些戏剧是根本上、极度地非自然的”(Richardson 2015: 19)。由此,理查森认为,要理解非自然叙述,读者必须要具有双重解读框架:即一方面了

解模仿框架,另一方面又明确作者有意地突破、颠覆、戏弄模仿框架的努力(Richardson 2015: 45)。

尼尔森从唤起读者不同阐释策略的角度界定非自然叙述。在他看来,主流叙述学假定叙述者的存在有助于将虚构叙述理解为一种对现成事物的报道,假定叙述者已经知道或者观察、体验到了要讲述的内容,从而将虚构叙述视为在某个框架下的非虚构作品。而非自然叙述抵抗现实世界的限制,要求唤起不受现实模式限制的非自然阅读策略,确立了另一种交流模式和框架。尼尔森对西摩·查特曼和费伦等人的叙述交流模式进行了改造,取消了叙述者这个概念,回归到最基本的模式:

真正的作者→叙述(其中的人物可能会对其他人物进行叙述)→真正的读者(Nielsen 2013: 88)

在尼尔森看来,只有作者才具有将故事讲给读者的权限和能力,所有的叙述功能都可以归结到作者或人物,因而取消了叙述者的存在。非自然叙述没有在“叙述者—作者的读者”这个轨道上,而是在“作者—作者的读者”的轨道上,作者可以突破叙述交流的限制。反对叙述者的存在就是反对只以非虚构的方式解释文本。此外,尼尔森还指出,不仅反模仿叙述需要有特别的阐释方式,“任何使用与虚构话语相关的创造和可能来探索非创造性(non-inventing)交流所阻碍的选项的作品”(Nielsen 2016b: 468)都需要。

对于理查森、尼尔森等人试图保留非自然特性的倾向,阿尔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当理查森、尼尔森、伊韦尔森认为运用认知的参数去规范化或驯服非自然成问题之时,我则小心地不将非自然当成纪念碑而完全将它遗弃在可理解的限度之外”(Alber 2016b: 17)。他提出了阐释非自然叙述的九大阐释策略:1) 框架的混合(The blending of frames),比如现实生活中没有飞马,但可以将对“马”和“鸟”的认知框架相融合,从而理解飞马这种不可能的事物;2) 类型化(Genericification),唤起文学史上的一般惯例(evoking generic conventions from literary history),比如“会说话的动物”或“时间旅行”这些不可能事物,可以通过童话或科幻小说这些类型来理解;3) 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将“不可能”理解为人的梦、幻想、幻觉等;4) 突出主题(Foregrounding the thematic),将“不可能”理解为主题的说明,而不是现实的再现;5) 寓言性阅读(Reading allegorically),将不可能情景或事件视为抽象的想法或概念的再现;6) 讽刺与戏仿(Satirization and parody),将“不可能”理解为讽刺或戏仿而进行的夸张、

变形等;7) 假定超验的领域 (Positing a transcendental realm), 假定为天堂、地狱等超验领域以理解“不可能”;8) 自助式阅读 (Do it yourself), 读者在互不相容的故事情节中进行取舍, 构建自己的故事;9) 禅宗式阅读 (The Zen way of reading), “禅宗的阅读方式预设了一个细心而冷静的读者, 他否定了先前的解释, 同时接受了非自然场景的陌生感, 以及它们可能在他或他身上唤起的不舒服、恐惧、担心和恐慌的感觉” (Alber 2016b: 47—57)。在这些阐释策略中, 前八种都是将非自然叙述“自然化”, 对于理查森来说, 应用于非模仿作品是可以的, 但如果应用于反模仿叙述, 就抹杀了非自然叙述的特别之处。而“禅宗式阅读”表面看来和理查森的观点近似, 但实际上也不同。在理查森的双重框架下, 读者欣赏作品中对模仿的颠覆和戏仿, 因此会享受非自然叙述带来的乐趣。而在“禅宗式阅读”中, 读者只是感知到非自然叙述与现实认知参数的差异, 接受消极感受, 并不能真正领会有意颠覆模仿框架的意义。事实上, 阿尔贝更是在验证认知叙述理论和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正如他自己总结的: “……我的目标是通过讨论极具挑战性的案例, 并展示认知叙述学的工具如何使它们更可读, 从而丰富叙述的认知方法” (Alber 2016b: 20)。显然, 这与维护非自然叙述独特性的理查森看法非常不同。

由上可知, 在如何阐释非自然叙述的问题上, 大致可分为两类, 理查森称之为“内在论”与“外在论”两大阵营, 前者强调非自然叙述的特殊性并在阐释中保持这种特殊性, 后者以将非自然叙述自然化作为最终目标: “内在论的理论家 (尼尔森、伊韦尔森和我) 强调违反模仿规约的优先性。我们不否认其他心理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效果;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在于叙述越界 (narrative transgressions)。外在的方法, 是阿尔贝所赞同的, 寻求解释非自然事件的认知功能, 并确定它们的意义。看起来阿尔贝至少对确认和欣赏非自然与解释和理解它们同样感兴趣” (Richardson 2015: 19)。

四、争议与质疑

“非自然叙述学”引起的强烈反响中, 也有一部分是争议和质疑。比如, 有些学者对非自然叙述学是否有必要提出了疑问: 偏离主流叙述规约的叙述有漫长的历史, 在“非自然叙述学”兴起之前, 也已经有不少研究和

讨论。比如安斯格尔·纽宁和娜塔亚·贝克塔(Natalya Bekhta)不赞同理查森对此前的叙述学模式很少考虑反模仿的、实验性文本的论断,认为从理查森的目标论文中也难以发现超出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等人的后现代小说研究的理论严谨性和批判性洞察力的东西(Nünning and Bekhta 2016: 422)。布莱恩·麦克黑尔自己也说:“在非自然叙事里,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经典叙事学工具所不能描述的东西。实际上,她(指玛丽亚·麦凯莱——引者注)认为这就是我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所做的研究:我把经典叙事理论的工具应用于‘非自然’文本。在当时,这种研究模式似乎被运用得很好,现在我看不出它不能被继续运用的任何理由”(转引自尚必武 170)。的确,在作为一场运动的非自然叙述学兴起之前,学界对于偏离模仿模式的叙述现象也有所讨论。理查森等人也承认非自然叙述学并不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也受到此前理论家工作的启发,比如理查森列举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让·里卡尔杜(Jean Ricardou)、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大卫·海曼(David Hayman)、伦纳德·奥尔(Leonard Orr)、布莱恩·麦克黑尔、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和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等研究者的贡献(Richardson 2015: 23—27)。尽管如此,在理查森看来,有些讨论仍是以主流叙述为主的模式,并没有正视非自然叙述的特殊性,而依然是有意无意地忽视它们:

许多传统的理论家可能会声称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容纳我所讨论的反模仿文本;他们只是把它们放在长长的光谱(spectrum)的最远端,从而似乎可以解释这些作品,同时确保它们几乎是看不见的。我认为这是忽视或无视这些重要作品的另一种方式,这些作品的实践如果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就会威胁到它们所处的光谱和模仿模式本身。(Richardson 2015: xvii)

面对“没能提出一个具体的叙述学概念”的尖锐批评,理查森和阿尔贝列举了众多类型的“非自然叙述者”“非自然的人物”“不可能的事件序列”和“矛盾的设置”等非自然叙述学的概念,指出他们研究了对非自然叙述概念化的框架和脚本。“除非我们大错特错,否则这些现象以前还没有如此系统地讨论过”(Alber and Richardson 7)。在理查森的目标文章中,也概括了非自然叙述学对叙事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叙述、故事及情节和时间、虚构心理三个主要方面(Richardson 2016b: 401—402),这些也说明了非自然叙述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拓展叙述学的目标。

另一个容易引起质疑的是,非自然叙述学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不

能成为严密的诗学。比如托比亚斯·克劳克(Tobias Klauk)、梯尔曼·科佩(Tilmann Köppe)的《重估非自然叙述学:问题与展望》(“Reassessing Unnatural Narratology: Problems and Prospects”,2013)对《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超越模仿模式》一文进行了精确的解剖,指出了该论文中的逻辑矛盾和含混之处,也对其中一些命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被批评的联名论文是2010年的文章,只突出了几位非自然叙述学的倡导者的共性,是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反映非自然叙述学的多元、复杂的面目,因而尽管批评很有力,但由于批评对象并不能完全代表非自然叙述学,尤其是随着后来理论家们进一步明确各自的立场,有些批评已经失去了意义(比如没有统一的非自然叙述的定义,非自然叙述学不能构成一种新的叙述学等)。认知叙述学家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对理查森模仿与反模仿叙述的对立也不以为然,认为理查森夸大了反模仿与模仿之间的界限,也低估了模仿叙述的复杂性。而在理查森看来,戴维·赫尔曼等人将对所有叙述的讨论都建立在非虚构叙述的基础之上,且是从大的理论框架落实到对具体实践的分析之中,容易将具体叙述整合到已有框架之中,从而抹杀非自然叙述和其他叙述的差异,有过度普遍化、简化的风险,“甚至完全错过了我们在叙述虚构中最看重的价值”(Richardson 2012: 237)。以理查森和戴维·赫尔曼为代表的部分认知叙述学家的分歧在于非自然叙述是否具有特定属性,是否需要补充另外的理论。一方否认,一方坚持,这使得二者立场尖锐对立,难以调和。

有一些理论家则提出全面的叙述学是否必要以及是否可能的问题。詹姆斯·费伦指出非自然叙述学是建立在输入输出模式之上,即是和其研究对象相匹配的理论。理查森确立了MIMO(mimetic in, mimetic out,模仿的输入、模仿的输出)与AMMIAMMO(mimetic and anti-mimetic in, mimetic and anti-mimetic out,模仿与反模仿输入、模仿与反模仿输出)的二分法,并强调后者。费伦举例说,2012年《叙事》杂志春季号上,短篇小说理论家们发现任何忽视简洁性所带来的差异的叙述理论都是有缺陷的。而其他诸如媒介、场合等各种叙述变量的拥护者也都有类似的抱怨。当理论建构的主要原则是输入输出模式时,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裁决(Phelan 416)。的确,如果每一种特别的分类都需要一种理论,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诉求是没有尽头的。而因为非自然叙述学建立在特定叙述实践之上,费伦也对非自然叙述学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理论也有所怀疑:“它是一种与现有的诸如女性主义、认知、修辞理论相匹敌的实质上的新理论吗?或者,它主要是一个产

生对其他理论需要整合的叙述元素的局部洞察的发动机?还是别的?”(Phelan 415)布莱恩·理查森则强调随着叙述学实践不断发展,叙述学理论也应该随之丰富和拓展。的确,和所有文学理论一样,叙述学也应具有开放性,这一原则没有问题。不过,出现新的叙述形态和实践是否要求相应的特定理论,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多余的,是见仁见智的。显然在布莱恩·理查森看来,特殊的非自然叙述实践的出现有必要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而费伦则表示怀疑。而这两种立场似乎也不好调和。

原属于非自然叙述学阵营,后来更偏向认知叙述学的玛丽亚·麦凯莱则对非自然叙述学提出了更高的期许,也对理查森等人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她指出,理查森以极大热情去列出“非自然叙述”的清单并分类,就像在亚马逊丛林中找寻最奇特的、前所未见的昆虫。但是如果要对认知范式提出质疑,就应该革新关于阅读框架的自然的假设,而不该把重点放到对非自然叙述进行或多或少的分类上。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做非自然叙述学,而不是寻找非自然叙述。如果我们仅仅用一个新的语料库来面对自然叙述学,我们就没有解决认知方法的根本问题——关于意义生成的普遍主义主张和经济的总体原则。……理论不能建立在例外之上,如果我们希望挑战占主导地位的‘自然’叙述原型,我们不仅应该寻找偏离的作品,而且还应在所谓的原型内工作,这包括既定的文学惯例和叙述,我们中的一些人称之为“普通的现实主义文本。”(Mäkelä 2016: 463)

在此,麦凯莱认知叙述学的立场很明显,她将非自然性视为一种普遍性的挑衅,期望建立一种适用于全部叙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叙述学。这种立场又回到了理查森等人所批评的主流立场,理查森等人倡导非自然叙述学的初衷,就是要求公正地对待特定叙述,用同一种理论框架不加区分地对待不同性质的叙述正是原有叙述学的缺陷,理查森等并非在建立理论框架,而是对已有框架进行补充与拓展。因此,对偏离主流模式的非自然叙述的寻找和考察正是建立特别理论框架的基础。

五、未来展望

尽管非自然叙述学一直伴随着争议,并没有形成一个有着统一的定义和框架的理论整体,但它确实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非自然叙述实践细致地进行了梳理与归纳,以具体的叙述实践作为对照,重新审视原

有叙述学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对叙述学有所补充与修正。非自然叙述学的最新成果是两部专著和一部论文集。理查森的《二十一世纪的情节诗学:不规则叙述的理论化》(*A Poetics of Plo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orizing Unruly Narratives*, 2019)是对情节的一次细致审视,讨论了各种类型的开端、中部、结尾、时间、序列等,其中不乏此前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不规则类型。中国学者尚必武的英文专著《跨界的非自然叙述:跨国与比较视角》(*Unnatural Narrative across Borders: 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019)除了对非自然叙述理论的探讨之外,也倡导跨国与比较的视角,从非自然叙述学角度讨论了中国六朝志怪小说、当代穿越小说以及伊拉克小说等。新近出版的阿尔贝与理查森合编的论文集《非自然叙述学:拓展、修正与挑战》(*Unnatural Narratology: Extensions, Revisions, and Challenges*, 2020)将非自然叙述理论应用于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文化他异性(cultural alterity)和底层话语(subaltern discourse)讨论等意识形态领域,还讨论了包括非自然叙述与情感研究、沉浸、人物理论、叙述框架等问题,以及自传、图画叙事、戏剧和电影、表演研究和互动游戏书中的非自然叙述等,被学者保罗·道森称为“为巩固非自然叙述学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引人入胜和指导性的见解”。可以预见,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非自然叙述理论会继续与修辞叙述学、认知叙述学、女性叙述学、跨媒介叙述学等后经典叙述学分支相互辩驳、相互影响,叙述学原有概念和框架会继续被审视和讨论,非自然叙述仍会得到关注和讨论。尽管针对所有叙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非自然叙述学”不可能成立,但这些基于非自然叙述实践的理论建构必然会对原有叙述学有着有益的拓展,从而指向一种更全面、更包容、更有效的叙述学。

六、个案分析:罗伯-格里耶《幽会的房子》的非自然叙述学解读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写作的目标就是颠覆当时被视为小说圭臬的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小说,恰好与非自然叙述学的倾向相一致,在此以《幽会的房子》(*La Maison de rendez-vous*, 1965)^①为例分析。

《幽会的房子》中有一个“我”讲述自己的经历。但这个“我”并非始至终都在场,整部小说以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叙述。由于第三人

称的叙述也可视为不出场的“我”的讲述,所以,“我”的隐匿不着痕迹。但在反复隐匿和出现中,“我”的身份和形象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加模糊了:

开头“我”在看年轻女郎和高大的舞伴在舞厅跳舞,并注视着她退到一边。正在交谈的一个“面色红润的粗壮男子”和一个“穿着无尾常礼服的高大黑影”(根据后面的叙述可以确认是拉尔夫·约翰森)遮住了她(532)。前者讲述有关刚下船的美国人、阿瓦夫人、蓝色别墅的故事,“我”也在听,但“有两三个词听不清楚”(536),因此,“我”不是约翰森,也不是“面色红润的粗壮男子”。后来,“我”开始讲述“阿瓦夫人家的那个夜晚”(538):“我”九点十分来到蓝色别墅,时间尚早,朝左拐进花园,看到了一对男女的戏剧性场面等,当晚“我”在黄包车上看到牵狗女郎。第562页阿瓦夫人向“我”介绍约翰森,而我早认识他,似乎这个“我”又有点像是“面色红润者”。但几十页之后,约翰森乘坐人力车看到牵狗女郎,被中尉盘问时,他的讲述与“我”的一模一样,也是九点十分来到蓝色别墅,向左前方,看到了洛伦与未婚夫决裂的戏剧性场面,并继续讲述当晚的经历。一次重大的混乱产生了。接着再一次出现混乱:在小剧院大厅对约翰森讲故事的“面色红润者”被称为叙述者(589)。是“面色红润者”“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他者”讲述吗?他的讲述又是从哪里开始的?由于约翰森与“我”可能重合,所以这也是可能的。再过几页,“讲到这里,约翰森停了下来”一句毫无征兆地出现(602),再次打乱了叙述秩序。前面的叙述似乎又应被视作约翰森的“我”的讲述。接下来,约翰森作为“他”于九点十分来到了蓝色别墅,一进大厅,面色红润的男子和他攀谈起来,他去和洛伦跳舞……叙述似乎又接续上了以前的线索。但“我”从舞台表演中间从大厅走到花园(605),突然发现了已经描写过的场面:洛伦向拉尔夫开枪的戏剧性场景(607)。这与前面“我”的描述有矛盾。矛盾之处接连出现:第610页“我”回答去过香港,而这又是“面色红润者”的特征。第622页“我重新开始并概括一下”,整个故事又以另一种秩序重新被讲述,“我曾经说过”等提示说明,这个“我”与前面的叙述者“我”有延续性,但“我”的身份仍然不能确定。在叙述者身上的疑云一直笼罩着。即使将“我”和约翰森、“面色红润者”的重合之处视为巧合,将“我”看作另外一人的话,这个“我”的身份仍是可疑的。阿瓦夫人告诉“我”马内雷的死讯时,“我当然知道”(560)。“我”为什么早就知道?和阿瓦夫人又是什么关系?在那个晚上,“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这些情况一直到小说结束都不明了。

这部小说如果按照模仿模式的理论来分析,就会遇到困难。比如,按照费伦的叙述定义:“某人在某种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告诉别人发生了某件事。”在这里,叙述者身份不明,叙述目的也难以把握,甚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难以确定,难以从话语层面中推导出前后一贯的故事世界,因而,按照模仿框架去理解就难免南辕北辙。

理查森在《非自然声音》中讨论了三种极端叙述代理,并对后现代不可靠性进行了归纳,这三种是:1) 对话者的形象,或无实体的质疑声音 (the figure of the interlocutor, or disembodied questioning voice), 介于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模糊二者边界,但又超越它们;2) 消解叙述 (denarration), 其中叙述者否定或抹去所创造的世界;3) 渗透性叙述者 (permeable narrator), 即说话者超越了个体意识感知的界限,特定人物的意识在没有任何解释的前提下融合在一起。后现代不可靠叙述者的类型有:1) 欺骗性叙述者 (The Fraudulent Narrator), 指故意违反模仿规约出现明显时代错误、认知错误的叙述者;2) 矛盾性叙述者 (Contradictory Narrators), 对同一事件叙述了多个矛盾版本,且没有任何解释;3) 渗透性叙述者 (Permeable Narrators);4) 不相称的叙述者 (Incommensurate Narrators), 不断变化的、非人格化的、多声部的异质叙述超越或调换了单一叙述者的感知;5) 跨层叙述者 (Dis-framed Narrators), 指叙述者从一个叙述层次跨越到另一个层次 (Richardson 2006: 103—105)。我们参照理查森的非自然叙述者模式,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幽会的房子》:不再将小说叙述者理解为有明确模仿目标的单一的叙述者,而是不断游移变化、呈现出复杂声音的“不相称的叙述者”。这个游移不定的叙述者,它的感知范围并不限于某个单一意识,而是融合了约翰森和面色红润者的感知,也带有“渗透性叙述者”的特点。叙述中对类似场景进行了多次叙述,而这些叙述并不能整合在一起,而是既相似又有矛盾,且没有任何解释,也可以从“矛盾性叙述者”的角度进行解释。

如果采用模仿框架来理解《幽会的房子》,一上来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小说第一页题记是:

作者一心想要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看作对于香港的生活纪录。背景或处境与香港的任何一点相似都只是偶然的結果,不管这样的結果客观与否。(527)

第二页又有另一个题记:

假若某个读者,远东中途停靠港的常客,无意中认为,这里描写的地方与实际不符,那么,自己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的作者,就会建议他再来这里好好看一看:在这些地区,事物在迅速地变化着。(528)

第一个题记强调小说不是对香港生活的纪录,如有相似只是偶然。第二个题记则又以作者本身的经历告诫读者,如果认为描写与实际不符,那是因为事物在变化,也就是强调小说是对香港生活的实录。这两种说法是从具有同样权威性的叙述主体说出的,因而具有同样的可靠性,但二者相冲突,不能同时为真,但又不能彻底否定其中一个,因而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就是最为典型的“消解叙述”。

一般叙述中出现矛盾是正常的,但通常都可以用不可靠叙述、观察的不同视角等方式进行解释,将一些错误叙述否定,而保留下可靠的叙述,从而能够还原出首尾一贯的故事。《幽会的房子》中反复出现类似场景和事件,但这些叙述之间不完全重合,带来的矛盾远远大于一致。对此,我们难以确定哪一种叙述绝对可靠,任何一种叙述都值得怀疑。比如《幽会的房子》里反复提及爱德华·马内雷之死,但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小说中竟有多种不同的叙述:

1. 阿瓦夫人的女仆、欧亚混血女郎——金——受到爱德华·马内雷的威胁,拴在楼下的狗感到女主人有危险,挣脱皮带,上楼来咬断了他的后颈;(621)

2. 阿瓦夫人与身份不明的“我”探讨爱德华·马内雷之死:一名警察了解到爱德华·马内雷的罪行,试图勒索他,发现马内雷给他的饮料有异,而用中国尖刀杀死了他,又伪装成马内雷跌倒、被摔碎的玻璃杯脚刺穿喉咙的假象;(631—632)

3. 阿瓦夫人对拉尔夫·约翰森说,爱德华·马内雷刚刚被某党杀害,借口他是为对手党派效力的双重间谍,实际上与账目结算有关,警方将约翰森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648)

4. 拉尔夫·约翰森向马内雷借钱,接连遭到拒绝,于是对准马内雷的心脏连开了五枪。(653)

尽管这些马内雷之死的说法并非出自同一个叙述者,但小说中并没有对这些相冲突的叙述进行肯定或否定,因此直到小说结束,我们也难以确认到底哪种叙述是真实的,所以各种叙述都变成可疑的。如果从模仿框架来解释,就会发现很困难。而从“消解叙述”进行解释则迎刃而解:小说故意通过相冲突的叙述策略使小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从而打破

模仿框架,不让读者沉浸在一种似真的幻象中,而需要读者理解叙述有意对模仿框架的颠覆,小说的意义也来源于此。

注解[Note]

- ① 以下引文均出自阿兰·罗伯-格里耶:《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第一卷),陈侗、杨令飞编,邓永忠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文中仅标注页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lber, Jan. "Gaping before Monumental Unnatural Inscriptions? The Necessity of a Cognitive Approach." *Style* 50.4 (2016a): 434–441.
- .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2016b.
- Alber, Jan, and 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ology: Extensions, Revisions, and Challeng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20.
- Herman, David, et al. *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12.
- Iversen, Stefan. "Permanent Defamiliarization as Rhetorical Device; Or, How to Let Puppymonkeybaby Into Unnatural Narratology." *Style* 50.4 (2016): 455–462.
- Mäkelä, Maria. "Narratology and Taxonomy: A Response to Brian Richardson." *Style* 50.4 (2016): 462–467.
- . "Cycles of Narrative Necessity: Suspect Tellers and the Textuality of Fictional Minds." In *Stories and Minds: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Narrative*. Ed. Lars Bernaerts, et al.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2013.
- Nielsen, Henrik Skov. "Naturalizing and 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 Focalization Revisited." In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Ed. Henrik Skov Nielsen, Jan Alber and Brian Richardson.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13. 67–93.
- . "Inventing Unnatural Narratives." *Style* 50.4 (2016): 467–474.
- Nünning, Ansgar, and Natalya Bekhta. "'Unnatural' or 'Fictional'? A Partial Critique of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 *Style* 50.4 (2016): 419–424.
- Phelan, James. "Unnatural Narratives and the Task of Theory Construction." *Style* 50.4 (2016): 414–419.
- Richardson, Brian.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06.
- . "Response by Brian Richardson." In *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 David Herman et al.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12. 235–245.
- .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P, 2015.

---. "Rejoinders to the Respondents." *Style* 50. 4 (2016a): 492–513.

---.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Style* 50. 4 (2016b): 385–405.

乔纳森·卡勒:《理论中的文学》,徐亮等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尚必武:《跨越后现代主义诗学与叙事学的边界——布莱恩·麦克黑尔教授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第166—171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自然叙述学研究”(16BZW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长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